

张栻早期仁学思想考

苏 铨 盛

[摘要] 张栻哲学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仁学,以《仁说》为代表。从胡宏问学以来,他一直关注、探索仁的问题。张栻仁学的发展和演变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从哀集旧编《希颜录》、编纂《洙泗言仁录》到修订《希颜录》为一段;其二是从争论观过知仁、以觉训仁、朱熹《仁说》到自作《仁说》为另一段。从《希颜录》起开始,至撰写《仁说》为止长达十四年之久,张栻一直开拓这个儒学核心观念,终于形成其独特的仁学思想。而且这一段时间是在张栻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前一时期,他广泛搜集儒家典籍当中有关仁的孔子言说和颜子言行,然后取舍选择,确定次第,加点北宋理学家和他自己的见解而成的。其主要目的是让学者先了解“求仁之方”,然后“自进于圣人之门墙”。后一时期,以讨论与论辩形式来检讨湖湘诸儒和朱熹有关仁的言说与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仁学观点,以树立自己的仁学思想。本文集中讨论前一时期,即张栻早期仁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之历史过程及其意义。

[关键词] 张栻 仁学 早期仁学思想 为仁之方

Abstract One of the kernels in Zhang Shi's philosophy is the doctrine of benevolence, represented by his *On Benevolence (Shuo Ren)*. Ever since Hu Hong consulted with him, he has been concerned about and exploring the issue of benevolence. The growth and evolution of his doctrine of benevolence falls under two stages. During the first stage, he collected, far and wide, Confucius' observations and Yan Zi's words and deeds on benevolence i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monographs. And then he made his own choice from among the materials, accepting this or rejecting that and giving an order of them, and combined them with certain amount of the opinion of the North-Song-Dynast Confucian idealist scholars and that of his own. Hence his own doctrine on benevolence. In so doing, his main purpose is to make other scholars know "the way to be benevolent", and then make them "understand Confucius' doctrine of benevolence by themselves". At the second stage, he set about to examine the doctrines and viewpoints on benevolence of the Huting scholar's and Zhu Xi's as well, and then he presented his own point of view on the doctrine of benevolence. The present paper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the growth and evolution of Zhang Shi's doctrine of benevolence at its early stage.

Key Words Zhang Shi; the Doctrine of Benevolence; the Doctrine of Benevolence at Its Early Stage; the Way to Be Benevolent

[中图分类号] B244.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03)05-0043-11

作者简介: 苏铨盛(Sho, Hyun-Sung 1967—), 男, 韩国人, 哲学博士, (韩国)成均馆大学讲师, 主攻宋明理学与中国哲学。

一、导 言

张栻，字敬夫、钦夫、乐斋，号南轩，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没于孝宗淳熙七年（1180），谥宣，祖籍广汉（即今四川绵竹）。他继承二程与胡宏之学，阐明自己的理学思想，确立了湖湘学派，乃南宋时期著名理学思想家。时人将之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一代学者宗师”^①。他创建城南书院，讲论于岳麓书院，培养了许多理学家，兴盛一时。

中国儒学进入赵宋之后，经过北宋五子之开拓，确立了自己的一套新儒学体系。到了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有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之学并立，互相反复论辩切磋，成为一大风气。由此他们各自形成自己的理学思想，向各个方向开拓了宏大精密的理学体系。因此，研究宋代理学者，绝不能忽视乾、淳年间之理学家。

乾、淳年间，张栻的确是很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当时从游张栻者甚众，形成一个独立学派，时人评价很高。如南宋周密在《齐东野语》中称：“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惟广汉张氏敬夫、东莱吕氏伯恭、新安朱元晦而已。……盖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传，而伊洛之学，至诸公而始无馀蕴。必若是，然后可以言道学也已。”^② 乾道三年（1167）秋八月，朱熹出访潭州（今湖南长沙）晤张栻，回来之后在与门人书中称道：“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料。近读其语说，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③ 这种高度评价并不是凭空夸言的。张栻不仅是通过论辩影响朱熹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而且他的思想本身具有理学思想的丰富涵义。他的思想确有其特色，是“理学”到心学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张栻哲学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仁学，以《仁说》为代表。他撰写《仁说》与他同朱熹曾共同讨论《仁说》有直接关系。然而，从整个张栻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过程来看，写作《仁说》并不是一时之感兴，而是较长的时间里他冷静思考和探索的自然结果。所以，可以说有关“仁”的思想是张栻哲学的重要部分。

还在年轻时，张栻奉父亲张浚之命从胡宏（1105—1161）问学。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栻初谒胡宏。然而此两年，即绍兴二十九年（1159）他已哀集《希颜录》上下篇，将之寄给胡宏请教。胡宏阅览《希颜录》之后，评价颇高，谓圣门有人。绍兴三十一年，张栻于文定公书堂初见胡宏。张栻曾在与陈平甫书中说：“始时闻五峰胡先生之名，见其话

^① “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指张栻），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参阅陈亮《陈亮集》卷2《与张定叟侍郎》，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2页。

^② 周密：《齐东野语》卷1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2页。

^③ 朱熹：《朱熹集》卷24《与曹晋叔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7页。

言而心服之,时时以书质疑求益。辛巳之岁(1161),方获拜之于文定公书堂。”^①不幸胡宏与张栻的师徒之缘不长,仅得一两次见面问学之后,胡宏病没^②。拜访胡宏之前,张栻已有师事胡宏之意愿,通信问学。因资料的缺失,当时张栻向胡宏“时时以书质疑求益”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然而观看五峰回答张栻的信函及修订本《希颜录》跋文,便可大致了解张栻所探索的问题不外于“求仁之方”与“以颜子为准的,致知力行,趋实务本”^③的圣门之学。概括来讲,从五峰问学以来,张栻的哲学探索一直是“仁”。这种局面无论时间的流逝和交流的扩大,仍然不断地发展深化,直到乾道九年(1173)完成《仁说》为一段落。

迄今为止,对张栻仁学思想的研究仍然不足。其间研究者几乎没有关注过朱、张两人的仁说与仁学思想。据我所知,首次设章专论朱熹仁说的是牟宗三先生。他在《心体与性体》第三册中集中分析讨论朱熹仁说的意义和问题,兼论朱、张之间的争论和湖湘儒者之观过知仁等问题^④。这对朱、张仁说的研究起了很重要的影响,研究者继之而作,出现了很好的成果。但他们的研究都把朱熹放在研究的首要位置,张栻则只是配角而已。他们都不免一个传统的道统观念,或者由此而来的种种成见,不以独立的、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张栻仁学的意义和特点及其价值。相比之下,有人从张栻的观点和立场来着手,比较朱张之间的相同相异,这是一个发展和改善。但仍须以全面的、动态的方式来研究张栻仁说和仁学思想的来源、形成等演变发展过程。

二、张栻仁学的直接来源

张栻对“仁”这个儒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始终怀着特别的关心和持久的探索,这恐由胡宏之教导所引起。虽然张栻从胡宏问学的时间不长,但胡氏之谆谆教导和张栻的执着夙愿是不可忽视的。

胡、张两人的思想关系也许可以从不同的两个角度来说明,即发展的发明与批判的继承。前者起于在胡宏没前以书信或面谈的方式来教导的,后又在张栻生平中不断发明探索的课题,如求仁之方等。这主要表现于《希颜录》、《洙泗言仁录》、《仁说》等作品,从绍兴二十九年(1159)起到乾道九年(1173)为一段落。后者是在胡宏没后,对五峰著作和一些理学思想所进行的批判的检讨中来获得的新认识,如心主性情等。这集中表现于《知言疑义》。乾道六年(1170)张栻知严州(今浙江建德)时,与任严州州学教授吕祖谦及朱熹共论《知言》。之后三人反复切磋,最后由朱熹亲自整理三人共论的内容成《知言疑义》。

① 张栻:《南轩集》卷2《答陈平甫》,第910页。在本文中所引用的南轩文集都来自杨世文、王蓉贵校点本《张栻全集》(全3册),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② “然仅得一再耳,而先生没”,见《南轩集》卷2《答陈平甫》,第910页。

③ 《南轩集》卷3《跋希颜录》,第1012页。

④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正中书局1969年版,第三册第四章,第229—354页。

朱熹在为亡友张栻作的神道碑中云：“先生(胡宏)一见，知其大器，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指告之。”^① 该文已充分显示张栻从五峰游学时受教的便是“孔门论仁亲切之指”。此外，此文又表明《希颜录》的归趣在何处，张栻对仁的探索实从《希颜录》开始的。陈亮(1143—1194)曾在《胡仁仲遗文序》中概括五峰之学说：“比得其前文观之，……可为自尽于仁者矣。其教学者以求仁，终篇之中，未尝不致意焉。”^② 从此来看，当时胡宏所教的莫非于求仁之方。在这种背景下张栻撰写《希颜录》，遗憾的是张栻早期仁学的代表作《希颜录》已佚，今日无法看到它的具体内容，也就无从知晓当时他如何理解孔门之仁学。因此，现在我们只能以侧面的资料来考察当时胡宏与张栻之间的仁学影响关系和内容。

绍兴二十九年(1159)，张栻哀集《希颜录》上下篇之后，将此文寄给胡宏请教。胡氏认真阅读之后写了一封题文和回信，一是《题张敬夫希颜录》^③，另一是《与张敬夫》^④。笔者认为，此两文约在绍兴三十年(1160)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胡宏病没前之作。据朱熹所撰张栻父亲张浚行状云：“再娶蜀国夫人宇文氏，……先公(张浚)五年薨。”^⑤ 张浚没于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八月，从此逆算则绍兴三十年便是张栻母亲宇文氏卒年。五峰在《与张敬夫》中提到“不意尊妇人倾背，伏惟孺慕号绝，何以堪居”，这指宇文氏之卒而说的。由此可知胡宏之回信约于1160年张栻母亲卒后写的。胡宏又在该信中说“下问以为仁之方”，这是说当时张栻以书质问的是“为仁之方”，胡宏所教的也是“求仁之方”，同编《希颜录》的目的完全符合。

在此信中胡宏说了日后对张栻仁学思想影响颇大的一句话，即“仁也者，人之所以为天也，须明得天理尽，然后克己以终之”。胡宏认为仁为人与天相通的内在的道德途径，所以彻底明得天理之后，以克己完成。“仁也者，人之所以为天也”是仁之形而上的预设，“须明得天理尽，然后克己以终之”是认识和实践的大纲。胡氏虽然还未明确地提示如何明得天理的具体方法，是超越的心得还是格物致知的穷理，但以“须明得天理尽，然后克己以终之”来看，先要做明得天理、然后以克己终之的求仁方法。前者是对仁体或天理的心得，后者是克己复礼工夫，以此可致“心与天无二”^⑥的孔子从心所欲境界。从此来看，胡宏对仁的理解相当倾向于物我一体的境界。这在胡宏之思想中是很明显的，所以门人彪居正问“为仁”时，他回答说：“欲为仁，必先识仁之体。……万物与我为一，可以为仁之体乎？”

① 《朱熹集》卷8《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第4544页。

② 《陈亮集》卷14，第165页。

③ 《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2页。

④ 《胡宏集》，第129页。

⑤ 《朱熹集》卷95下《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第4900—4901页。

⑥ 《胡宏集》，《与张敬夫》，第133页。

……要在识之而已。”^① 这种看法还往往出现于《知言》，如“仁者，天地之心也”^②、“仁者无不爱”^③、“仁则知通之言一，不仁则以通言为二。若心与迹判，则是天地万物不相管也”^④。从此我们可以归纳出“仁一天地之心一爱一无二”的胡宏仁学思想及其对张栻的影响。

除胡宏之外，二程对张栻仁学思想的影响尤为深刻。张栻《仁说》的宗旨是程颢仁学思想之继承；“爱之理”、“公”概念及其与仁之关系模式是程颐的影响。胡宏之影响是直接的启发和引导，使张栻在“孔门论仁亲切之指”中下功夫，二程则使张栻确定仁思想的根本方向，且对思想内涵及具体的运思方面均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张栻曾在《跋希颜录》中说：“盖颜子之事，独载于论语、易、中庸、孟子之书，其间颜子之所自言，与夫见于问答者抑鲜矣，特圣人之所称及，曾子孟子之所推述者，其详盖可以究知也。自孟子之后，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识其然者则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横渠张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则又尽发其大全，于是孔子之所以授于颜子，颜子之所以学乎孔子，与学者之所当从事乎颜子者，深切著明，而无隐于来世者矣。故今所录，本诸论语、易、中庸、孟子所载，而参之以二程先生之论，以及于濂溪、横渠与夫二先生门人高弟之说，列为一卷。”^⑤ 在此他申明说如何作《希颜录》，又说自孟子直到北宋周敦颐、张载、二程才能了解颜子所以为颜子之所以然。所以他在《希颜录》中积极引用发明二程之颜子之论。

这种影响在他编写《洙泗言仁录》时进一步表现出来，他说：“昔者夫子讲道洙泗，示人以求仁之方。……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其传，其论仁亦异乎秦汉以下诸儒之说矣，学者所当尽心也。某读程子之书，其间教门人取圣贤言仁处类聚以观而体认之，因哀鲁论所载，疏程子之说于下，而推以己见，题曰洙泗言仁，与同志者共讲焉。”^⑥ 张栻编《洙泗言仁录》的动机、根本旨趣及其具体方法等都受到二程的深刻影响和启发。

三、张栻仁学的形成

张栻仁学思想并不是一时之感兴，而是在较长的时间里琢磨思索的结果。从哀集《希颜录》起，直到撰写《仁说》为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然中间不可避免会有一些观点、思想的改变和转折。这对一个理学家的思想历程是正常现象，其实也是对既有的观点积极反省切磋的自然结果。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当中，当时不少的理学家，在张栻仁学的形成与发展道路上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作为仁学思想源泉的二程、启发和引导者的胡宏、刺激和讨论者的朱熹、批判的检讨者的湖湘诸儒等，虽然他们所担当的角色各不相同，然而就

① 《朱熹集》卷73《胡子知言疑义》，第3864页。

② 《胡宏集》，《知言·天命》，第4页。

③④ 《胡宏集》，《知言·纷华》，第25页。

⑤ 《南轩集》卷33，第1012页。

⑥ 《南轩集》卷1《洙泗言仁序》，第752页。

张栻仁学思想的形成、演变来讲,都有积极的、肯定的意义。在此笔者要集中考察《希颜录》、《洙泗言仁录》时期张栻仁学之演变。

张栻仁学的发展和演变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从袁集旧编《希颜录》、编纂《洙泗言仁录》到修订《希颜录》为一段;其二是从争论观过知仁、以觉训仁、朱熹《仁说》到自作《仁说》为另一段。这种分段基本上是以张栻仁学探索的时间推移和形式来划分的。前一时期,他广泛搜集儒家典籍当中有关仁的孔子言说和颜子言行,然后取舍选择,确定伦次,加一点北宋理学家和他自己的见解而成的。其主要目的是让学者先了解“求仁之方”,然后“自进于圣人之门墙”,这是“致知力行,趋实务本,不忽于卑近,不遗于细微,持以缜密”的道路。后一时期,以讨论与论辩形式来检讨湖湘诸儒和朱熹有关仁的言说和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仁学观点,以树立自己的仁学思想。在探索仁的问题过程中他使用的形式和目的有所差别,这点该先了解。

(一)《希颜录》与“为仁之方”

宋代儒家都认为孔子达到了儒家仁学的最高理想境界,但他们不以为能学而达到孔子境界,孔子是不可学而达到的圣人。所以他们须找一个可学而达到的另一个模范,这就是颜子。二程云:“圣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状。若颜子底一个气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学圣人,且须学颜子。”^①又说:“圣人之动以天,贤人之动以人。若颜子之有不善,岂如众人哉?惟只在于此间尔,盖犹有己焉。至于无我,则圣人也。颜子切于圣人,未达一息尔。”^②这里所说的圣人是孔子。圣人之德行圆满而足,无我之境,不可名状形容,很难达到孔子,所以欲学圣人者须先学颜子。因为颜子是未达一息之亚圣也。宋儒对颜子的评价极高,较为一致,这与周敦颐的积极推崇和学习、二程的发扬有很大的关系,如“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③、胡瑗(993—1059)以“颜子所好何学”为题考察太学诸生时程颐所作的《颜子所好何学论》^④之类就是明证。

与此相反,宋儒对孟子的评价不尽相同,有人评价很高,有人却嫌孟子的气象^⑤。倘

①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页。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11,第126页。

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第16页。

④ 《河南程氏文集》卷8,第577页。

⑤ 宋儒对孟子的议论并不少,或非或疑或辩或黜者都有。南宋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列举种种批孟之见。据此,自《荀子·非十二子》非疑思、孟、后汉王充有《刺孟》以来,宋代有何涉《删孟》,司马光《疑孟》,李靓有《常语》,陈次公《述常语》,傅野《述常语》,刘原父《明舜》,张俞《谕韩愈称孟子功不在禹下》,刘道原《资治通鉴外纪》,晁以道《奏审皇太子读孟子》等。此外又有郑叔友《艺圃折衷》,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之文。参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11—13,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1—106页。此外宋儒关于孟子的研究和尊孟辩等可参考以下资料:董洪利:《孟子研究》第9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以下;姚瀛艇:《宋儒关于孟子的争论》,载于邓广铭、漆侠主编《中日宋史研讨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328页。

若将颜子和孟子相比的话,孟子就差了一步,如二程云:“孟子才高,学之无可依据。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有用力处。”^①“孟子之于道,若温淳渊懿,未有如颜子者于圣人几颛后世谓之亚圣,容有取焉。”^②二程对颜子和孟子的这种比较评价对后儒起了直接的影响。张栻《希颜录》则在这种背景下所作。

《希颜录》初作上下两篇,后修为一卷,附录一卷,均佚失,今只传《希颜录跋》^③。据跋文,旧编完成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其主要目的是广泛收集颜子言行,以此尽量发明其心,深切著明学者所当从事颜子之所以然。颜子言行散见于各种典籍,因此须要广采颜子之事,特别载于《论语》、《易》、《中庸》、《孟子》等儒家经典,《孔子家语》、《法言》、《文中子》以及《正蒙》、《二程遗书》等儒家子书和各种史籍,甚至《庄子》的推述,以通通归纳稽考。录完之后,他把该书寄给胡宏请教。胡氏阅读《希颜录》之后对张栻的评价和期望很高,盛赞说“圣门有人”。朱熹也说:“先生(指胡宏)一见,知其大器,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指告之。公(指张栻)退而思,若有得也,以书质焉。而先生报之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奋厉,直以古之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一篇,蚤夜观省,以自警策。”^④胡氏不止于此,劝他更加究索玩味,说道:“于未精当中求精当,此事是终身事。”再经十四年之琢磨,乾道九年(1173)修订新编《希颜录》一卷,附录一卷^⑤。张栻在新编中修改了去取伦次,形式上也进行了改定,即“本诸《论语》、《易》、《中庸》、《孟子》所载,而参之以二程先生之论,以及于濂溪、横渠与夫二先生门人高弟之说,列为一卷。又采《家语》所载颜子之言有近是者,与夫扬子云《法言》之可取者,并史之所纪者,存之于后”为附录^⑥。当时张栻向胡宏质问求教的内容大致不外于为仁之方也。胡宏在复张栻的信中云:“下问以为仁之方。”“仁之道大,须见大体,然后可以察己之偏而习于正。”“仁也者,人之所以为天也,须明得天理尽,然后克己以终之。”“来教曰仁岂易言哉!须会于言意之表,而的然有见焉,可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第19页。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第21页。在宋代这种比较评价不少,而且大部分认为颜子胜于孟子,如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说:“孔子赞周公赞召公,不赞太公。颜子得为,为尧、舜、文王;孟子得位,为汤、武。”参见《邵氏闻见后录》卷3,第23页。虽然尧、舜、文、武、成汤、周公均为儒家之理想圣人,而也有层次上的高下。若颜子得位,能为尧、舜、文王之王道德业,孟子得位至大为汤、武之革命盛业,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明显易见的。

③ 《南轩集》卷33,第1012页。

④ 《朱熹集》卷89《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第4544页。

⑤ 今传《跋希颜录》文尾署期有一点错误,云:“乾道元年八月九日谨书。”然在文头却云:“某己卯之岁,尝衰集颜子言行为希颜录上下篇,今十有四年矣。”从“己卯之岁”运算“十有四年”则当为乾道九年癸巳岁也。“九”与“元”字体相似,恐错字矣。今当改作“乾道九年”。

⑥ 在《答胡季随》第4书中,张栻说:“某顷年编希颜录,如庄子等诸书所载颜子事多削去,先生以书抵某云:‘其它诸说亦须玩味,于未精当中求精当,不可便容易指以为非而削之也。’此事是终身事,天地日月长久,今十有二年矣,愈觉斯言之有味,愿吾友深体之。”参见《南轩集》卷25,第902页。在此张栻所引的“先生以书抵某云”则指胡宏回张栻的《与张敬夫》。

也。”充分表明了当时胡、张两人之间的话题是“仁”或“为仁之方”^①。

张栻认为,从一般学者的见识来看,颜子之学恐似卑近易学,其实颜子所以受到孔子的赞扬也在此也。儒学并不是高远而难知的,所以“惟实用其力而后知其难,知其难以后有可进之地也”。在《希颜录》中张栻尽力追求“以颜子为准的,致知力行,趋实务本,不忽于卑近,不遗于细微,持以缜密,而养以悠久,庶乎有以自进于圣人之门墙”的工夫,是当时张栻的主要关心之处和学问特点,后日对他自己仁学思想之影响甚远。张栻对颜子仁学的这种执着并非偶然,而是张栻的自觉和气象之表现,所以南宋儒者评价说:“濂溪、明道似颜子,伊川、横渠似孟子,张栻似颜子,晦庵似孟子。”^②这句话相当程度上隐含着张栻对仁学和颜子的关心和所下的工夫。

在此阶段张栻并没有显示出对仁之某种形而上的涵义或本质的定义方面的兴趣,而胡宏却教他应先了解“仁之大体”,这样就容易觉察自己的偏误并做纠正^③。又强调说:“仁也者,人之所以为天也,须明得天理尽,然后克己以终之。”^④胡宏确实强调先理解仁之形而上的涵义,然后用克己工夫来完成。虽然在《希颜录》中张栻对这个方面没有足够的关心,然而胡宏之教导使他有新的思考和探索。

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张栻云:“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万物者也。”^⑤又在《桂阳军学记》中说:“夫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该遍者本体也。在乾坤曰‘元’,而在人所以为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长也。’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礼》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而人之所以私伪万端不胜其过失者,梏于气,动于欲,乱于意,而其本体以涖溺也。虽曰涖溺,然非可遂殄灭也。”^⑥引文中“夫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该遍者本体也”是演绎胡宏的“仁也者,人之所以为天也”而来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写于乾道二年(1166)仲冬;《桂阳军学记》则为乾道五年(1169)之作。由此来看,张栻仁学思想从编写《希颜录》之后在胡宏影响下有不断的深化。到编《洙泗言仁录》时期,经过同朱熹讨论,有所修正,但对仁的基本理解和观点仍然没有很大的改变。这对张栻仁学思想的旨归和与朱熹思想的不同方面来讲是值得注意的。

(二)《洙泗言仁录》与张栻仁学之成立

乾道七年(1171)春二月任职于尚书左司郎兼侍讲的张栻为孝宗讲《诗·葛覃》。同年三月,张说除签书枢密院事。对此张栻极为不满,夜草手疏,极言其不可,且诣宰相质责之。由此一事,同年夏六月张栻出知袁州(今江西宜春),冬十二月归长沙居。居长沙时,

① 《胡宏集》,《与张敬夫》,第129页。

②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3丙篇,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3页。

③ “仁之道大,须见大体,然后可以察己之偏而习于正”,见《胡宏集》,《与张敬夫》,第133页。

④ 《胡宏集》,《与张敬夫》,第133页。

⑤ 《南轩集》卷10,第693页。

⑥ 《南轩集》卷9,第684页。

他编《洙泗言仁录》。乾道八年(1172)朱熹作《仁说》，乾道九年(1173)张栻也作《仁说》，因此《洙泗言仁录》对朱熹和张栻之仁说均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张栻曾在与朱熹书中云：“某近因与乔、潘考究论语论仁处，亦有少说，续编录呈。”^①在此所说的“论语论仁处”乃《洙泗言仁录》，但《洙泗言仁录》今已逸失，留其序于张栻文集。

朱张两人在仁的基本观点和旨归上有所不同，因此无论在具体的理解上，还是在宏观的把握方面都难免分歧。这一点在《洙泗言仁序》中明若观火，为了论述的方便，引全文于下：

昔者夫子讲道洙泗，示人以求仁之方。盖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谓仁也。人惟蔽于有己，而不能以推，失其所以为人之道，故学必贵于求仁也。子孟子没，寥寥千有馀载间，论语一书家藏人诵，而真知其旨归者何人哉？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其传，其论仁亦异乎秦汉以下诸儒之说矣，学者所当尽心也。某读程子之书，其间教门人取圣贤言仁处类聚以观而体认之，因哀鲁论所载，疏程子之说于下，而推以己见，题曰洙泗言仁，与同志者共讲焉。嗟乎！仁虽难言，然圣人教人求仁，具有本末。譬如饮食乃能知味，故先其难以后其获，所以为仁。而难莫难于克己也。学者要当立志尚友，讲论问辩于其所谓难者，勉而勿舍。及其久也，私欲浸消，天理益明，则其所造将有不可胜穷者。若不惟躬行实践之务，而怀薪获之心，起速成之意，徒欲以聪明揣度于语言求解，则失其传为愈甚矣。故愚愿与同志者共讲之，庶几不迷其大方焉。”^②

张栻为什么编《洙泗言仁录》呢？与朱熹书中说：“论语仁说，区区之意，见学者多将仁字做活络揣度，了无干涉，如未尝下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工夫，便做仁在其中矣。想象此等极害事，故编程子之说，与同志者讲之，庶几不错路头。”^③他批评当时学者大部分把仁理解得太灵活、含糊，又过分发挥主观的想象，而均忽视“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工夫”，但其实做仁就在于这些卑近工夫之中。同样的忧虑又表现于与乔德瞻问答，说道：“近日学者论仁字，多只是要见得仁字意思，纵使逼真，亦终非实得。看论语中圣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迩，循序积习，自有所至，存养体察，固当并进。存养是本，工夫固不越于敬，敬固在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难。”^④他认为当时学者对仁学的理解上最大的弊端是过分追求主观的阐释，却忽视了实质的工夫。这种倒错现象是危险的，非纠正不可。所以他提出存养体察并进。

张栻编《洙泗言仁录》的具体指导方针是从程颐来的。门人刘安节(字元承，永嘉人)

① 《南轩集》卷2《答朱元晦》第8书，第861页。

② 《南轩集》卷14《洙泗言仁序》，第752页。程元敏先生曾经对该序做过研究，值得参考。见《张栻洙泗言仁编的源委》，《孔孟学报》第11期。

③ 《南轩集》卷2《答朱元晦秘书》第15书，第852页。

④ 《南轩集》卷2《答乔德瞻》第1书，第930页。

向伊川问仁时,伊川回答说:“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①张栻效仿伊川之言教搜集孔子所言有关仁的言说编排而成。在《洙泗言仁序》中云:“某读程子之书,其间教门人取圣贤言仁处类聚以观而体认之,因袁鲁论所载。”朱熹对这种“圣贤言仁处类聚以观而体认”的方式极为不满。他在与张栻书中批评说:“类聚孔孟言仁处,以求夫仁之说,程子为人之意,可谓深切。然专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长欲速好径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②他甚至在与门人范伯崇书中说:“钦夫近为学者类集论语仁字,各为之说,许寄来看。然熹却不欲做此工夫,伯崇以为然否?”^③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栻与朱熹之间不免有所争论。朱熹在《答钦夫仁疑问》中,对洙泗言仁说进行逐条地批判,且劝说:“言仁之书,恐亦当且住,即俟更讨论,如何?”^④又在一封信中批评说:“细看言仁序云‘虽欲竭力以为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此数句似未安。为仁固是须当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⑤张栻也接受朱熹之批评,对该改订或补充的地方进行修改。之后回答朱熹说:“洙泗言仁中‘当仁不让于师’之义,旧已改,‘孝悌为仁之本’,‘巧言令色鲜仁’之义,今亦已正,并序中后来亦多换,却纳一册去上呈。”^⑥朱张两人围绕洙泗言仁录展开讨论,而这直接引起朱熹写作仁说的念头。

朱熹不愿意张栻刊行颁布此书。为什么朱熹积极劝张栻不要刊行《洙泗言仁录》呢?表面的理由是使后学之仁学功夫上引起不少的弊病,所以说:“恐不免长欲速好径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盖专务说仁,而于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无复优柔厌饫之味,克己复礼之实,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离了爱字,悬空揣摩。既无真实见处,故其为说恍惚惊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爱字看却之为愈也。熹窃尝谓若实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⑦然而朱熹所提到的当时学者对仁理解上的弊端,其实与张栻在种种书信中所批评的弊端相当一致,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仁的理解和观点上两人有不少的差别。

总之,张栻仍然强调求仁之方。他说孔子在《论语》中所讲的是求仁的具体、实际的方法和实践。这是从《希颜录》时期张栻一直保持的原则性理解。与《希颜录》时期相比,他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18第182页。

② 《朱熹集》卷3《答张敬夫》第6书,第1312页。

③ 《朱熹集》卷3《答范伯崇》第13书,第1828页。

④ 《朱熹集》卷3《答钦夫仁疑问》第16书,第1398页。在此信中,朱熹对张栻有关论语仁字的各种解释进行严厉批评,可能是针对张栻《洙泗言仁录》而发的。

⑤ 《朱熹集》卷3《答张敬夫》第8书,第1316页。在此信中朱熹对洙泗言仁序之一些内容加以批评。朱熹所批评的文章已不见于现传言仁序,盖张栻接受朱熹之看法以改矣。朱熹又批评说:“近年说得仁字与智字都无分别。……气象浅迫,全与圣人语意不相似。”他认为张栻把仁与智的不同涵义没有严格区别。朱熹认为谢上蔡和湖湘诸儒以觉解仁,这是仁与智不加区别的弊端,因此也向张栻要求更加明确的区分两者的意义。

⑥ 《南轩集》卷2《答朱元晦秘书》第13书,第840页。

⑦ 《朱熹集》卷3《答张敬夫》第6书,第1312页。

所注意的是“盖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谓仁也”之言说。仁是宇宙的生之蕴，又赋与人的道德心，因此仁是人与宇宙的联系环结。然若无仁，人与天地截然分开，只好人为人，天地为天地，互相不能相通而孤立。胡宏在评价《希颜录》的信中说：“仁也者，人之所以为天也。”又在《知言》中说：“仁者，天地之心也。”^①在此所谓天地之心之明确的涵义仍然难以捉摸。然而在此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张栻仁思想已经有所变化，即着重朴素实际的求仁之方，同时追究仁的形而上的、本体论的原理之阐释。

四、结 语

从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仁学思想是张栻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从胡宏问学以来，他一直关注、探索仁的问题。从哀集《希颜录》起开始，编《洙泗言仁录》，与朱熹辩论《仁说》，讨论观过知仁、以觉训仁，修订《希颜录》，到自己撰写《仁说》为止，长达十四年之久，张栻一直开拓这个儒学核心观念，终于形成其独特的仁学思想。而且这一段时间在张栻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段时期。

对于本文所重点探讨的张栻前一时期的仁学思想，由于第一手资料的不足和佚失，我们无法了解早期仁学思想的具体内容和丰富涵义。依笔者管见，在此阶段他并没有显示出对仁的形而上的兴趣。这恐与胡宏之教有关。有时胡宏强调“求仁之方”，使张栻多留意一点儿具体的、实践的意义方面；但有时却要求须了解“仁之大体”，即仁之形上涵义，然后用克己工夫来完成。张栻早期仁学思想的特点仍在“求仁之方”上面。此时他已形成有关仁学的重要思想和宗旨，但还没有达到系统的了解。这还得需要一定的思考和琢磨。他与朱熹辩论朱熹《仁说》的种种问题之后，才逐步形成《仁说》。这是张栻仁学思想的代表作，同时也标志着其仁学思想的完成。但从对仁学问题的叙述形式和探讨方式以及其思想内容等方面来看，《仁说》之仁学思想的确是—与早期仁学思想有所不同。所以笔者在此先对其早期仁学思想材料进行研究，后期仁学思想则待另文阐述。

^① 《胡宏集》，《知言·天命》，第4页。“仁则知通之言一，不仁则以通言为二。若心与迹判，则是天地万物不相管也”，《胡宏集》，《知言·纷华》，第25页。